

教育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交汇点，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首先要建设教育强国，而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地方高校在高等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更是在服务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所在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地方高校是所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高层次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朝气蓬勃有为青年最多的地方，有责任有使命成为区域产业升级急需人才的培养地、科技创新人才的集聚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孵化器，在推动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善作为。

在培养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急需人才上善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一种先进生产力，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加以数字赋能、技术改造，围绕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和新发展理念要求，布局新产业，发展新经济，形成新动能。地方高校要保持市场敏锐性，紧密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技术服务变化：一方面，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使学科布局、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布局相适应，让新入学学生的专业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充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要。另一方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采用微专业、辅修第二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等多种形式，对在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方向进行优化，缩短适配人才的输出时间，为地方产业升级改造赢得人才支撑的

地方高校要在服务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善作为

□ 陈小林

先机。

此外，还应利用好现代产业学院这个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抓手。现代产业学院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多主体协同育人的优势，强化人才培养的适配性，形成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育人功能，把产业对人才的能力需求转化为现代产业学院学生的课程设置和实践锻炼要求，及时培养出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产业急需人才。

在助推地方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上善作为。身处非省会城市的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企业，高层次人才引进难留住难，企业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缺乏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支撑，所处地方高校要发挥创新人才集聚的独有作用。地方高校具有先天优势，最有利于了解和掌握地方企业发展情况，最有利于校企之间形成稳定长久的合作机制，也最有利于得到开发区、高新区管委会等

地方政府部门对校企合作的支持和推动。地方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一是深化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大力推动学校高层次人才经常性入园进企，甚至在没有教学任务时入驻企业挂职、兼职，把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创新等产业实践问题转化为学校教师的科研攻关课题，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二是围绕地方重点产业链、主导产业集群建强学科。围绕所在地方重点产业链、主导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布局重点发展学科，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强学科师资队伍，为地方产业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加大资源投入，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科研条件，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服务产业发展。三是校企合作，人才共引成果共享。由高校和企业建立合作机制，比如企业出资学校出编、引进人才的成果产出由校企双方共享，这样既减少高校引进人才的成本，又能增加企业对引进人才的吸引力，解决

了企业引进人才难的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地方高校成为地方科技创新人才的集聚地，助推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培养地方青年创业人才上善作为。当前新经济、新业态、新领域不断涌现，青年创业者在其中扮演了也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新事物接受快转化快，对社会充满期待和热情，是未来创业人才出现的主体，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高校发展依靠地方，同时也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不仅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而且要源源不断地培养青年创业者。地方高校应夯实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简单开足创新创业课程，更要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把创新创业能力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首先，改革创新创业课程。科学安排创新创业课程，精心设计具体教

学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增强学生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和实践场景的把握和融通。其次，组建强有力的教学团队。要下力气组建一支固定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创业案例，灵活运用体验式教学、项目制教学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最后，建立创业导师队伍。长期聘请创业导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评估学生提出的创业方案、创意设计，指导学生完善创业项目方案，推动落地实践。定期举办校友创业故事会，用身边人身边事进行教育和引导，增强学生情感认同。通过教育引导，培养一批又一批愿意留在高校所在区域创业发展的青年人才。

在推进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上善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做好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地方高校应成为所在地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的中心，在助推地方技术创新转移转化，技术赋能产业创新和未来产业布局上作贡献善作为。设置区域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由高校和地方科技部门共同组建区域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专司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负责对接创新成果方和技术需求方，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解决技术需求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快成果转移转化速度。

发挥高校大学科技园的孵化作用。拓展大学科技园的物理边界，尽管在所有权上大学科技园归属一个特定大学所有，但在服务科技转移转化上应把其建设成为所在区域大学师生共同的技术孵化和创新创业基地，充分挖掘大学科技园的带动作用。建立大学科技园与高新区（开发区）联动机制，发挥大学科技园创新要素集中、高新区（开发区）空间大的资源互补优势，在大学科技园发展壮大的创新企业，对接进入高新区（开发区）发展，而高新区（开发区）引入的企业，生产基地在园区，研发中心可以设立在大学科技园，真正实现校企融合、产学研用协同。

组建联合创新研究院。围绕地方重点产业链和主导产业集群，高校可以联合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联合创新研究院等技术创新载体，加大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组成融合产学研的多方专家团队，既有利于发挥企业对行业发展趋势的主动识变优势，及时提出技术需求，又能快速转化为科研人员技术攻关的科学应变举措，加大研发创新的针对性，从而提高后期研发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率。

（作者系景德镇学院党委书记）

（上接1版）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握手，号召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现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同时强调党在同国民党合作时只有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才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此，中国人民掀起了气壮山河的抗战热潮。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总结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时提出，统一战线是第一大法宝。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坚持这一政策并非易事。一方面，这一重要决策在党内遭到王明教条主义的反对。他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定了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而不是人民的身上。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来自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但直接针对的就是王明的这一右倾错误主张。另一方面，这一重要决策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干扰和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发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击退了反共高潮，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如果进一步联系后来的重庆谈判直到召开建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可以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党为统一战线而奋斗所作的艰辛努力有多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实施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谱写的又一精彩华章。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发生的。在抗战开始前，国民党营垒中一些人就悲观地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亡国论”和“速胜论”此起彼伏，对全民族抗战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已经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特别是他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这一著作，在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同时，系统而

又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强调中国只要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必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一发表就在国内外包括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决定把一般战争中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充分发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优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了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不仅集中阐述了共产党为什么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性，而且阐述了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敌我相持阶段为什么要坚持敌后游击战的道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实施持久战这一战略总方针和敌后游击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施持久战以及敌后游击战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这两大决策，贯穿其中的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具备优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只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实施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就能够把劣势转化为优势、被动转化为主动，创造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奇迹。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坚持，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凝聚力；正是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正确战略战术的提出和实施，创造了巨大的军事优势，形成了在人民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战争伟力。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又在抗日战争中接受实践检验。遵循“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真理作出的政治军事决策及其创造的政治军事优势，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伟大抗战精神之“魂”和“根”

抗日战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实践，不仅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的胜利。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赢得的伟大胜利。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进程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经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转型，最后在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中形成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以此为新的历史起点走向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可以通过思想、道德和艺术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都会汇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民族精神上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向世界展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伟大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对于伟大抗战精神的领悟，既不能仅仅满足于字面上的解读，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动中加以理解，而要把这一精神的形成放到中华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和理解，才能认识其深刻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国家蒙难和人民觉醒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蒙难”引发“觉醒”，“觉醒”带来“转型”，中国近代史正是一部中国人在民族觉醒过程中的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国粹优越论”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直到向“欧化”“西化”的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些文化转型，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又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文化转型的量变终归要引起质变。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文化从发展到蜕变、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历史性转变。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根据这一思想提出的以“民族、科学、大众”三要素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基因构成和文化元素结构上的重大更新，而不是简单延续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伟大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构成和元素结构重大更新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结构性重构，好比浴火重生而“涅槃”的“凤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丹穴朝阳瑞气翔”的民族复兴之好运。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结构性重构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文化元素的更新上。

一是“魂”元素。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过：“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思想文化的这种根本转型和结构性重构，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纲常体系”之“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科学真理之“魂”。伟大抗战精神之“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坚定意志、斗争精神、科学预见。

二是“根”元素。毛泽东说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文化的根本转型和结构性重构，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中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元素，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伟大抗战精神之“根”，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

当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华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终于在凤凰涅槃后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及其体现的中华新文化，不仅引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这就是毛泽东1949年9月在著名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中深刻指出的：“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周易·革卦》有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短短数字，却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与道德期许。“君子豹变”，寓意君子如豹子成长般经历显著蜕变，幼豹成长中斑纹渐趋美丽鲜明，象征君子在修养、学识、品德层面由内而外升华；或似豹子行动敏捷迅速适应环境，体现君子敏锐洞察时代变迁并迅速调整。“其文蔚也”，则是指君子经修养成长，内在文化素养、道德品质等特质如草木茂盛般充分展现，焕发出耀眼光辉。这不仅是对君子成长过程的生动比喻，更是对自我修养、适应变化与彰显才华等人生境界的深刻指引。

在现实世界中，改变无处不在。君子之于个人、企业乃至社会，恰似中流砥柱，其改变的力量不容小觑。一个企业若能汇聚众多君子，以君子之道经营管理，必能蓬勃发展；一个社会若君子辈出，以君子之风引领风气，必能充满希望。当企业运转陷入困境时，从君子的视角反思，探究是否缺乏君子的智慧与品德引领，不失为寻求突破的良策。

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核心在于培养有理想、知荣辱、能上进、有追求的君子。从文字学角度剖析，“君”为会意字，上“尹”象征领导，如府尹乃府级最高长官；下“口”表示发号施令。最初，“君子”指代统治者、领导者、为政者，是贵族男子的统称。因其地位尊贵，故品德要求亦高，在其位必具其德，此为君子应有之义。君子深知道义，其德如风，吹拂社会各个角落；君子重义轻利，行为皆以道义为准则，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作为社会精英，君子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同时，君子之道也是个人修身的指南，指引着人们不断修养身心，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君子豹变，成就人格，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实现。

其一，树立高远笃定的人生追求。人生如漫漫征途，需明确前行方向。君子深知自己的志向所在，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正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历经艰难险阻，仍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这种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追求，赋予生命以崇高的意义与价值。

其二，勇担君子的使命。每个人在社会中皆有独特的角色与使命。教师以教育为使命，用智慧与爱心培育祖国未来的栋梁；医生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在生死线上与病魔顽强搏斗；企业家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价值为使命，引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砥砺前行。唯有明确使命并全力以赴，方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为社会发展贡

『君子豹变』成就人格

□ 杨朝明

献力量。

其三，涵养坦荡仁和的博大胸襟。君子胸怀宽广，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面对纷争与矛盾，君子以和为贵，秉持仁爱之心化解冲突；面对赞誉与成就，君子不骄不躁，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这种坦荡仁和的胸怀，使君子能够团结众人、凝聚力量，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

儒家学说聚焦于“爱”与“敬”的培养，当“爱”与“敬”融入生命，便会铸就君子人格。君子人格一旦形成，其影响力将如涟漪般不断扩散，不仅能助力个人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推动企业蓬勃发展，为民族复兴、国家繁荣注入强大动力。在当今时代，我们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以“君子豹变”为指引，努力成就伟大人格，为构建美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